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这是一个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寻找故事。

两人的相识，在浙江建德县大山深处的村庄里。一个22岁，穿着自编的草鞋，从杭州到那里已插队多年。一个18岁，是离那个村几里地远的纺织厂工人，这时，参加了支农工作队，来到了村里。

两个姑娘的走近，乃至成为好朋友，说不清是什么原因。两人后来都说是“有缘”。可是，这是个有着太多内涵的词，并非如“缘”这一字表达的那样混沌和恰巧。

其实，她算不上知青。三岁丧父，五岁母弃，被爷爷奶奶收养着。穷，小学读了一年，便辍学在家，帮着大人做家务。学了织毛衣，挣钱，自己却从来没穿过毛衣。毛衣的软和暖，只有手感。

她去山村插队，是老人给孙女找了一条自己养活自己的出路。当年的建德山村，也穷，天天吃玉米，吃不惯，还吃不饱。艰难度日的爷爷奶奶，哪有余钱给孙女寄吃的、穿的？她只能养几只鸡，卖了蛋后，换回油盐。

小妹是建德县城人，能体会到一个杭州姑娘落户山村的窘迫和艰辛。看到她的饿，便常常走几里地，给她带点好吃的。有时，当姐姐的饿得挺不住了，就去小妹住的厂区宿舍里。她相信，有小妹吃的，也会有她吃的。最高兴的是，姐姐跟着小妹去县城的家里。不必说大米饭管够，小妹的母亲会特地烧好几只建德家乡菜，让女儿和带来的小妹妹饱餐一顿。她感受到，这是一种母爱。

那一天吃完逛街，迎着秋风，落叶飘零。她与小妹在一起，孤单便被遗落在山村了，心里只有暖意。走过一家卖毛线的店家，那些五颜六色的毛线，唤起了她童年的记忆。走近柜台，她不由自主地对小妹说：“这种湖绿色的毛线可真好看。”小妹爽快回应：“你喜欢，我把它买下来。”掏出钱一看，还不够，差几元。“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回家去拿。”

这年冬天，她穿上了人生的第一件毛衣。走在寒冷的山路上，它的温暖，从心里弥漫至周身。

终于病了。一个孤独的年轻女子难以在这个穷山村再扛下去。

回到杭州，住址变了。这对小妹妹，几年后断了联系。婚后拉上丈夫，回建德

去找小妹。很多年里，杭州去建德的深山小村里，大路、小路、山道要走好几小时。找到那家纺织厂，已经厂去楼空，曾经吃过很多顿饭的小妹在县城的家，也找不到了。通过公安系统查找，结果，同名同姓几百个。她无奈叹息道：“那个是我的小妹？”

几十年里，那件湖绿色的毛衣，成了她唯一的念想。她把毛衣拆了又结，结了又拆，每年伏天，会从箱底拿出晾晒。女儿说，都不能穿了，扔了吧。孩子哪里知道，这是母亲怀想小妹的一种方式。

她不会想到，七十岁时，因为要捐献遗体，让寻找小妹的行动出现了转机。

那位跟踪她拍摄的摄影家问她，为什么要捐献遗体？她说，从前，我的日子过得很难，但有很多好心人帮过我，我要回报他们，也回报这个社会。现在，我最大的心愿是想找到在建德的小妹，希望大家帮帮我。

于是，有更多人知道了她的过往，有更多人开始帮她寻找。

第一个打电话给小妹的摄影师，说有人找她时，小妹瞬间说出了已回杭州50年的姐姐的名字：“这些年里，我也在找她啊！”

见面前几天的视频对话，流尽了半个世纪的眼泪。小妹的母亲仍然健在，手机上出现了老人的头像，她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妈妈，我好想你啊！”

两人手握手地坐在一起。心情平息了一些后，一位对她们50年的执着寻找感到好奇的人连着问：“从清纯少女，到白发苍苍，你们依然心心相印，最欣赏对方什么？为什么非要找到不可？”

两人停顿了一下，随即说出了相似的话：“是诚恳。我们两人都实实在在，从来没有虚的。”

诚恳，值得她们半个世纪的寻找，一辈子的牵挂啊！

小妹在得知姐姐要捐献遗体的缘由后，再也不说一句当初两人在一起时，姐姐对她的好。一个对世界“以身相许”的人，再去说她对自己的好，她觉得，难以对应了。

只是，小妹仍然显得温良、率真的眼神里，闪烁着泪光……

糖炒栗子

任溶溶

栗子。广州也有糖炒栗子，那是一个大栗子出售，又硬又粗，一点不能与上海的糖炒栗子相比。可见食在各地有各地之妙，不一定都在一个地方。

吃糖炒栗子要在上海。

俗话说，食在广州。但我作为一个小广州，却说不一定。有一样东西不是食在广州，而是食在上海，那就是糖炒



一个城市只有一棵铁树，你相信吗？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个夏天，铁树开花的奇闻传遍全城。开花的铁树在吾乡白塔公园，公园里每天人来人往，这个

小花圃却少有人问津，我有时会进去转转，见过那棵铁树，但我担保，注意过它的人极少。“千年的铁树开了花，万年的枯枝发了芽”，那还了得！于是，一城的人涌进公园，我当然躬逢其盛。不过，摩肩接踵的人们多半失望地离开，他们见到的

的，“就是一根大苞米啊！”铁树学名苏铁，其雄花确如玉米，这是我后来从书上读到的。我第一次发现铁树并不稀罕还是在上海植物园，时值冬季，裹着稻草，或正或斜，有数十株之多。做了防冻处理，说明此树不耐寒，是故在北方，它娇生惯养在温室。

有年十月，在三亚的七仙岭住了几日，此地植被茂盛，仿佛一个巨大的热带植物园。晨起散步，沿路的树木大多叫不出名字，只有椰子、棕榈、槟榔、芭蕉、铁树、旅人蕉这些还认识。在这样的纬度，铁树就更谈不上珍稀。

如果站在温带的立场看，这些都是“归化植物”，

移民群体，虽然尚未漫山遍野，但至少活了下来，只是它们看上去，与土著是那样地不同。不过，沧海桑田，谁知道是否有一天，会出现反客为主的局面呢？

铁树虽然离开了热带，但“模子”还在，一般人家的客厅、阳台还难容身。倒是不少写字楼门口会摆两盆，看中的是一个“铁”字：铁将军把门，此外便是耐旱，不必每日打理。

上海的街上，铁树、棕榈是寻常可见的，近年又多了非洲的加纳利海枣，但毕竟只是点缀，并不能令人产生置身于热带的感觉。一直要到冬天，它们被草垫包得严严实实，人们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一群外来植物。

十多年前，我在花市上买了一棵铁树，其实是一个与洋山芋差不多的小球，种在一个紫砂盆里，随后便是不断换盆，最后只能种在地上了。

每年，铁树都会抽出新叶，起初是蜷曲的，柔软，还没有沾染了尘埃的那种亮绿，不消几日，羽状叶便成为坚硬的针刺。

据说一株铁树可活两百年，种十余年可以开花，不过，我这株不施肥的铁树，要开花，恐怕要一百年

吧。但是去年，小区里的铁树却开花了，一雌一雄，堪称奇观。只是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，似乎没有谁注意到了铁树开花。

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贩卖一些植物学知识是件时髦的事情，什么三叶草、凤尾竹之类。诗人舒婷写过《日光岩的三角梅》，令人神往，北方读者到了鼓浪屿，才知道三角梅是再普通不过的植物。

近现代旅行的兴起，使人不但是从植物图谱上

10月22日我在晚报“十日谈”刊登了一篇《洋农庄里当农夫》的文章，没有想到，这篇小文章竟会传为佳话。

我的石化老友宏强兄是个热心人，当天他将文章电子版传给佐佐木先生的父亲。老人是日本久负盛名的农业专家，因不懂中文，就请他的律师一字一句读给他听。老人一边听，一边笑，当律师告诉他，《新民晚报》是上海市民最喜欢阅读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，佐佐木能够在报纸上亮相，说明你的儿子在上海创业打拼，干得不错啊！你完全可以放心了！

行千里父母难免担忧，何况20多岁在异国他乡打拼，到底会不会“水土不服”？18年来，佐佐木从开始研究无农药蔬菜试验栽培，到2015年创建了农业科技公司，2016年以来先后获得中国无公害蔬菜、上海市标准园和绿色食品认证，农庄的各类蔬菜打入了沪上有名头的超市和酒店。

宏强兄还告诉我，原本佐佐木的父亲萌生过让儿子回日本工作的念头，这次，因为晚报“肯定”了儿子的作为，佐佐木父亲对律师说，儿子在上海创业这么有出息，真好！

笔者退休前曾在合资公司工作过，在我的印象里，美籍员工和日本员工对纸媒十分“看重”，特别是日本员工。当年一位日籍的部门经理，因工作出色，我曾在石化的厂报上写过一篇关于他的小文章。后经公司国际部评选推荐，他被授予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。获奖后，他居然还携着日本太太到我家登门致谢。

谢谢编辑的鼓励，我没有想到，我的这篇小文章竟有如此的“功效”。在佐佐木的父亲转告我老友宏强，谢谢上海，谢谢《新民晚报》，儿子在上海创业，我放心了！

认识不同区域的植物，植物学素人也以一知半解的姿态记录、传播着自己的见闻。法国作家纪德1920年代曾有过一次非洲之行，在他的《刚果日记》中，记录了很多热带植物，但他经常表示，“这些树木我都不认识”。

如此说来，万人空巷，看一株开花的铁树，也没什么难堪的。毕竟你没有生活在热带，去一趟植物园，与去非洲相比，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。

吧。但是去年，小区里的铁树却开花了，一雌一雄，堪称奇观。只是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，似乎没有谁注意到了铁树开花。

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贩卖一些植物学知识是件时髦的事情，什么三叶草、凤尾竹之类。诗人舒婷写过《日光岩的三角梅》，令人神往，北方读者到了鼓浪屿，才知道三角梅是再普通不过的植物。

近现代旅行的兴起，使人不但是从植物图谱上

吧。但是去年，小区里的铁树却开花了，一雌一雄，堪称奇观。只是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，似乎没有谁注意到了铁树开花。

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贩卖一些植物学知识是件时髦的事情，什么三叶草、凤尾竹之类。诗人舒婷写过《日光岩的三角梅》，令人神往，北方读者到了鼓浪屿，才知道三角梅是再普通不过的植物。

近现代旅行的兴起，使人不但是从植物图谱上

吧。但是去年，小区里的铁树却开花了，一雌一雄，堪称奇观。只是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，似乎没有谁注意到了铁树开花。

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贩卖一些植物学知识是件时髦的事情，什么三叶草、凤尾竹之类。诗人舒婷写过《日光岩的三角梅》，令人神往，北方读者到了鼓浪屿，才知道三角梅是再普通不过的植物。

近现代旅行的兴起，使人不但是从植物图谱上

寻找诚恳

宁白



诗歌需要平常心

崖丽娟

绿洲，我所要做的，只是通过诗歌，把生活中细小的欢乐和感动收集起来、记录下来，得以时时警醒自我。生活也许尽是庸常的“一地鸡毛”，因为诗歌，生活中就有了“远方”的召唤、有了“诗意”的存在。不用过多茫然于诗歌的“无用”，也不用痛苦挣扎于诗歌的“无助”。当在诗歌中寄托和安顿了自己，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快乐。

静与救赎，我感到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，并愿意为此耗尽自己平庸的才华。

从当初亢奋的自发表作转变为冷静的自觉写作，是一个更为艰苦漫长的过程。会出现“被掏空”的情况，好在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，新的灵感重新出现；更重要的是，我明白了持续写作靠灵感和激情远远不够，更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。或许，正是这样的平常心告诉我，应该好好沉淀自己了。基于这样的想法，便拥有了摒弃俗念、获得自由的轻松和快乐。

诗集《会思考的鱼》2021年11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，这是继《未竟之旅》(2019年)、《无尽之河》(2020年)之后我的第三本诗集。

诗集《会思考的鱼》分为三辑：第一辑“标本”是触动生命之弦的轻拢慢捻、成长过程的酸甜苦辣；第二辑“对话”是人生岁月的记忆留痕，日常读诗写诗的情感共鸣；第三辑“时序”是对时光流逝的不舍感怀，季节轮转赐予的欣慰忧伤。如果说，《未竟之旅》题材内容主要集中于抒写爱情，风花雪月，《无尽之河》尝试拓宽到对大千世界自然万物的描摹，那么，《会思考的鱼》则更多在思想内涵的挖掘上进行多维度辐射，注重往“深”的方面做出努力：细究时序交替更迭背后世界的隐秘，叩问心灵深处幽微难表的情愫，谛听生命的清音，触探生活的本质，探寻人性的美好。

因为诗歌，我的人生有了很大不同。看得见的人和事，以及看不见的悲欢离合都因为被写入诗中而呈现不同的样貌，因而具有不可言说的意义。感恩在诗歌创作路上遇到那些美好和温暖，是生活中真善美的东西触动了。因为诗歌，我在喧嚣的尘世拥有了一片静谧的精神



不属于我们这个此岸世界的人。

在《江洋大盗》中，三毛称呼自己为“偷儿大盗红花独行侠”，她14岁便开始在家中“做案”，父母兄弟姐妹胡乱偷一气，偷父母的为人方正本分、偷姐姐的温柔敦厚、偷弟弟的虎胆……直偷得“昏天黑地。”19岁，三毛拿着父亲给的700美元，一张5元的汇票和5元现金，跪别父母，再别兄弟姐妹，漂洋过海，且行且“偷”，“向花花世界、万丈红尘里舍命奔去。”

三毛这种活泼的写作方式，也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一种新鲜感。

三毛到底是怎样的人？听说她的笔名来自于张乐平的《三毛流浪记》？1989年3月，三毛回到她40年来想都不敢想的大陆的家——这家里有她的“父亲”张乐平先生——确实，三毛笔名由《三毛流浪记》而得，张乐平就是她精神上的“父亲”。画家张乐平原是解放日报摄影美部的编辑，三毛因此和解放日报也有了某种特殊关系。那



冻干千颗蜜，尚带一抹霜 (中国画) 李知弥

天，三毛到解放日报做客，当时的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先生还请来了柯灵先生。在汉口路274号解放日报当时的会议室里，三毛弯腰问候坐着的柯灵先生，丁锡满站在他们俩中间，当时的文艺部主任吴芝麟先生作为东道主负责具体事宜，他站在柯灵先生侧后方，我则被派录音任务，因而站在三毛身边，手举录音机，这一瞬间，被本报的摄影记者抓拍下了。

三毛来了

那天三毛穿着张乐平先生送她的蓝的卡中山装，在腰际扎上一根皮带，下配牛仔裙、平底鞋，背上个牛仔包，倒也别致。记得三毛说了很多话：“我对于我自己的心，不能说它不是菩提树，也不是明镜台，我没那么高的，我心还是一面镜子，有空了去擦它。写作这条路很寂寞，不可能一群人吃吃东西就写出好作品来。我们以为我们的爱情是对一个男人、一个女人、一个家庭，不，不是的，如果我们这支笔杆不放下来的话，那么我

们这一生是嫁给了一盏灯。”三毛伸出细细长长但经过了沙漠风沙已不细腻的手指，夹着上海产的“丽都”牌香烟。人们还发现她烟和打火机不离手。三毛一到上海就抽上海烟，且发现“丽都”牌烟最好抽。

1991年1月4日，这位享誉世界华语文坛的女作家，被发现自缢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住院病房卫生间。没有留言，没有遗书，也没有向任何人做过临终嘱托。

2000年6月19日，柯灵先生病逝于上海。2015年12月24日，丁锡满先生因病在沪离世。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
岁月如流，一切都终将逝去。但1989年3月的聚会，还是留下了影像。足资追忆。

十日谈

歼6飞机虽已退役，却永远定格在我心灵的蓝天上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：杨晓晖